

朝贡体系与东南亚的适应策略研究

杜 军

宁夏师范大学 宁夏 756000

摘要：“朝贡体系”这一曾被高度程式化的叙事框架，长期以来主导了人们对东亚前现代国际秩序的理解。其所建构的“中心—边缘”结构图景，虽为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等级互动提供了范式，但也在不知不觉中，遮蔽了地方性主体的战略考量与制度调适能力。本文尝试跳脱单向依附式的解读路径，转而从东南亚国家的能动性 with 战略选择出发，重新审视它们在传统东亚秩序中的实际角色。文章通过对大越与暹罗两国的比较研究，揭示它们如何在“朝贡”这一看似固定的规则框架内，采取多元手法，实现自身主权的再生产与政治空间的扩展。这种行为方式表明，朝贡体系并非一套刚性制度，而是一种不断被实践所重塑的协商性秩序。通过这一视角，可以为东亚国际秩序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东南亚外交策略；朝贡体系再解构；制度灵活性；区域能动性；比较历史分析

引言

当我们回望东亚古代国际秩序的知识谱系时，“朝贡体系”几乎是无法绕开的起点。^[1] 自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以来，朝贡被赋予了明确的制度属性和文化意涵，进而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外交与周边互动的核心范式。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理论化进程在确立解释框架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固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想象——一个道义与制度上居于“中心”的中华帝国，以及围绕其运转的“附属单位”。在这一结构性叙述中，东南亚国家常常被默认为缺乏主动性 with 独立判断的制度承接者，其政治行为被简化为对“天朝秩序”的形式性顺从。

若将叙事重心由“中心”的制度建构转向“边缘”的制度运用与策略操作，或许会看到另一种秩序图景即朝贡并非某种外力的压制性建构，而是一种经由地方主体灵活参与、策略适应的交互机制。从“颁贡”制度的灵活运作，到“外王内帝”政治实践的双轨逻辑，再到借由“册封”确立统治合法性的仪式利用，东南亚国家展现出高度复杂的外交能动性与制度驾驭能力。

近年来，随着区域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突破“朝贡体系”的既有范式与框架，并尝试重新定义“朝贡”的意义。^[2] 在这一学术转向的背景下，重新定位东南亚国家在传统东亚秩序中的历史位置，不再将其视为“被整合入体系的对象”，而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区域行为者。其战略选择与制度操作，不仅关乎生存，更构成了对既定秩序的实质

性改写。

1. 朝贡体系的重构与东南亚的战略感知

1.1 介于规范与灵活之间的制度实践

1.1.1 “礼治”理想与利益博弈的双重结构

在多数帝国史叙述中，“朝贡体系”似乎天然地与等级、文明中心、道义秩序绑定，“华夏”自称天朝，万邦则循礼朝贡，仰其文明。但这样的观点过于静态与理想化。事实往往更复杂，也更具“人情世故”。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朝贡固然承载了政治象征意义，但同样是一种实用制度，既是宣示主权的仪式手段，也是调节边疆、获取异域资源的现实工具。而在东南亚国家的视野中，这套体系与其说是文化服从的表达，毋宁说是一种讲究回报的合作安排。朝贡贸易中“厚往薄来”的安排，令使节团得以携珍稀奢物而归，其政治价值与经济利润相互交织。这使得“贡使”并非“屈从”的象征，更像是一种精算后的外交策略。

更为微妙的是，册封与“纳贡”常常并非臣属的真实写照，而是新晋国王谋求国内合法性的一种外部加持。当继位过程有争议、或国内派系角力未息时，中原天子的“认可”成为一种有力的外部资源。这类“君臣关系”更多体现在文书与礼仪之中，实际的政治服从却因时因地而异。换句话说，朝贡体系的本质，或许并非一套强制性的政治结构，而是一个可以被谈判、被利用，乃至被掌控的制度平台。^[1]

1.1.2 明清时期朝贡逻辑的不同轨迹

朝贡实践本身亦非一成不变。例如明代，尤其明初，是海洋朝贡的繁盛阶段。郑和下西洋不仅是国家工程，更是一种外交剧场，其背后是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安排。明代推行的海禁政策，导致海上丝绸之路多有波折。明清时期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东来，充当中间商，进一步沟通了中国与日本、印度的丝绸之路。此外，郑和下西洋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的丝绸贸易。海上丝绸贸易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同时频繁的海上丝绸交往推动了西亚、东亚、东南亚等国丝织业的进步，逐渐有外国丝织品流入中国，形成了中外纺织品的双向交流。^[2]在这一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如暹罗、马六甲、满者伯夷等，借“朝贡”之名，行“入市”之实。他们接受天朝的礼仪安排，但更看重的是货物交换与政治互保的可能。

相较之下，清代的态度则显得更为节制。出身边疆的满族政权，其国家重心聚焦在北方草原与西藏高原，清廷对南方海洋世界的兴趣和干预明显不如明代。朝贡制度虽延续，却已从制度主轴变为象征性遗产。清代朝贡制度有着维护中国疆域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的具体目标，它构建的是中国周边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3]19世纪西方列强东来之际，朝贡网络的实际功能逐渐式微，其存在更多是为了维护“天下秩序”的名义姿态。也正是在此语境中，我们更能理解朝贡体系的“弹性”——它从来不是全然一致的规则集合，而是随王朝战略与资源配置不断演变的互动框架。

1.2 东南亚国家的策略演进

在现代国家体系出现之前，东南亚地区盛行的是各种本土政治体系，其中的“曼陀罗”体系就得到了东南亚史学界及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承认，这为检验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拓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朝贡任务是高度礼仪性的，涉及复杂的协议。使节们会带着象征他们的统治者承认中国优越性的礼物前往中国首都。这些使团通常包括当地产品、外来物品和来自朝贡国的代表。朝贡需要有相应的接待和赠品，称为“回赐”，也就是回赠礼物的意思。中国朝廷回报以珍贵的礼物、官印和爵位，这不仅肯定了朝贡国的地位，也为继续效忠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激励。由于可以和带来的物品视作交换，理解为贸易关系也并无不妥。^[4]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与东南亚的朝贡和贸易成为中国经济事务的焦点。15世纪以后，中亚贸易受到更多关注，但与东南

亚的商业关系的在清朝仍然持续存在。两大区域之间的互动整体保持了长期且复杂的联系。^[5]

东南亚国家并非朝贡体系中的默许角色。在互动之中，它们展现出远比传统文献所呈现的更强的能动性。其手段，既有操作规则、亦有边界试探即一个充满策略与试验的政治实验场。

一是“操控”。如同颁贡、夸贡、增贡这些操作，虽名为敬献，实为借规则之便争取更大利益。部分国家甚至因其“贡礼价值不对等”而屡遭中原官员私下抱怨，这恰恰表明朝贡并非单边馈赠，而是精致的筹码博弈。

二是“选择性遵从”。许多国家在表面臣服之下保有极大空间，能灵活决定哪些朝贡礼节应对，哪些则以时间、距离、内部事务为由予以搁置。这种看似消极的拖延，实则是政治技巧的体现：一边维持天朝关系的表象，一边保持自主行动的余地。

三是“策略性抵抗”。面对中原干预，其历史上不乏公开对抗的先例。或军事冲突，或文字争锋，它在“内称皇帝、外称王”的体制安排中寻找平衡，以“臣名”换“帝号”，在礼仪与实际主权之间保持巧妙张力。

由上可知，朝贡体系并非一个压倒性的外部秩序，而是一个多方协商的政治剧场。东南亚国家不是舞台布景，而是有计划、有话语、有策略的主角。在他们看来，朝贡是一种资源、一种话语工具，也是一种必要时可被质疑、抵抗甚至重塑的关系结构。

1.3 地缘分化下的不同战略路径

与中国陆地相邻的大越，其战略逻辑被高度安全化。既有直接的军事冲突风险，也有长期文化影响下的身份焦虑。大越通过构建“双重身份”：对外称王、对内称帝，在尊华的面纱下维持自身独立王权。而其官制、礼仪、典章虽广泛模仿中原，但也有意识地保留地方性表达。这种“文化对称下的政治抗衡”，成为其对抗结构性压力的重要方式。大越的政策代表了一种邻近的防御性文化策略。

相比之下，位于海洋世界的暹罗、满者伯夷等国家，其与中原王朝之间并无直接军事边界。朝贡之于它们，更多是一种“通道”而非“义务”。贸易是核心动机，册封则被视为提升合法性和区域地位的工具。这些国家擅长在区域力量之间骑墙而立，朝贡于中原的同时，也与西方殖民力量或印度洋其他势力保持联系。暹罗在海洋世界展现出以贸易为

轴心的灵活接触的姿态。东南亚的朝贡行为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特征，其参与的形式更具策略性、其臣服的姿态更为表面化。

2. 战略演绎的路径分化——以大越与暹罗的比较分析

2.1 “朝贡体系”的再审视

传统的“朝贡体系”在中原史料中被构建为一套井然有序、礼仪完备的道义秩序，以天朝为中心、万邦朝贺为标志。但对于地处边陲的东南亚国家而言，这一模式更像是一个政治与经济混杂的“制度舞台”，在理想与利益之间展开张力博弈。正如一位暹罗使臣所言：“礼不在词章，而在用得其所。”朝贡的仪式固然是权力象征，但背后的回赐与贸易机会才是实质吸引力所在。

对于朝贡国而言，参与体系不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外交表态，更是一种极具算计色彩的利益权衡行为。他们精心选择贡品、调整贡期，甚至在册封请求与贡礼之间创造“灰色地带”，以最大化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尊崇和现实利益并不矛盾，而是交织共存。

从明代的海禁制度与郑和下西洋，到清代相对保守务实的边疆管理，朝贡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框架。它既不是千篇一律的礼仪剧本，也并非一种权力强加的单一话语。陆上与海上的实践差异，映射出王朝对各地优先事项与战略目标的权变选择。

在大越与明、清王朝的关系中，礼制往往与兵力相辅相成，边界问题与正统性交织纠缠；而在暹罗、满者伯夷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海上航道的安全、物资交换的便利，往往主导了朝贡关系的性质。显然，“体系”并非静态，而是一种依附于地缘脉络与时代背景的“动态契约”。

2.2 东南亚国家战略能动性逻辑

东南亚国家不断运用策略、操控规则，甚至巧妙地扰动体系本身的运作节奏。操纵、选择性遵从、策略性抵抗，构成了其应对体系的三大支柱。例如，大越王朝往往在军事压力下重申臣服，同时又在礼仪与语义上主张自主性，如“外王内帝”一说，既安抚了天朝，又维持了本国民众对独立性的认知。暹罗则擅于通过频贡策略，将原本三年一次的朝贡“包装”为多次贸易机会，不断以顺从姿态换取实质利益。

制度的刚性往往被地缘现实打破。面对中原王朝的期待，东南亚国家并未采取僵硬回应，而是构建了一套灵活顺从策略。他们常常对有利的规则趋之若鹜，对不利的要求则

或拖延、或曲解，甚至选择时机性“短暂失联”。

在必要时，他们还会采取抵抗策略，例如在王位继承问题或边界冲突中采取敌对行为，但又迅速回归朝贡轨道，维系对外的体面。正是在这种灵活与务实之间，他们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博弈空间。因而，东南亚国家是体系的解构者，也是操盘者灵活，它们游走在在顺从与隐性抵抗之间的空间。

2.3 地缘视角下的战略抉择

大越之于中原，是一种典型的“紧邻型非对称关系”。这种地理的贴近意味着更高的安全压力与更频繁的政治碰撞。因此，大越构建了双层战略：在对外以恭顺的“王”自居；在国内则以“帝”号自尊，年号独立，仪轨自成。这种策略既是对现实力量结构的妥协，也是主权叙事的维护。

大越统治者在文化上不断追求“异中求同，同中有异”。他们一方面将儒学官制加以引入，一方面又强化“南国”独立正统的意识。这种文化维度的主动建构，实际上强化了其在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对海洋国家而言，中原王朝的经济价值远大于冲突。暹罗、满者伯夷、苏禄等王国在海上航线、转口贸易和中转港口中居于关键位置，他们以朝贡之名，行商业联盟之实。

朝贡成为海上国家获取市场准入权的外交通行证。与此同时，他们也精于在大国之间游走。当中原衰微时，他们迅速转向西方殖民力量；当局势转变，他们又重拾传统关系。这种灵活的外交姿态，反映了东南亚国家超越表面忠诚的战略圆滑。

3. 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双重变奏

3.1 大越的制度对抗与生存策略

与中原王朝陆路相接的国家大越为例，其外交姿态一直处于紧绷与周旋之间。每一次朝贡使团的组建，几乎都内嵌着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对“天朝秩序”的礼节性服从；另一方面则是在“权力仪式”背后争取实际利益、边境宽容甚至地缘喘息空间。大越的君主往往在对外称“安南国王”，而在国内则自封“皇帝”，使用独立年号，建立完整的礼乐制度。这种“外王内帝”的双轨制，不仅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更是制度生存术的一部分。

大越并非总是被动应对压力。在面对军事威胁或册封要求时，它曾多次表现出策略性抵抗。例如在黎利起兵时期或西山政权与清朝交锋的关键节点，大越不仅拒绝屈从，还借助地形与民间武装形成有效防御，迫使清廷接受其自主地

位的现实。这种“有限对抗、适度服从”的模式，使大越得以在历史上保持相对完整的政治自主性。

3.2 暹罗的主动权谋

暹罗王朝极其精于在多边格局中寻求平衡。通过控制贡期、贡品类型与随行商队规模，暹罗不仅获得了来自中原丰厚的回赐，还间接稳固了国内经济格局。朝贡贸易成为其王室控制奢侈品流通与高端工艺品来源的重要手段。在某些时期，暹罗的贡使甚至远超规制，借助此行完成与清廷贸易官员的“私下交易”，这种“礼制下的市场化”操作，在官方史料中或被一笔带过，但实则是国家生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区域外交中，暹罗王朝也善于通过“对称朝贡”构建自身权威。例如，它曾模仿中原做法，册封周边小国或部族首领，营造出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型朝贡圈。此举不仅提升了暹罗在区域内的地位，也让其在面对中原时获得了谈判资本，展现出“边缘国家”的战略主动性。因此，大越在权威面前更多表现出“谨慎周旋”，而暹罗则是在不直接受军事压迫的前提下，将朝贡体系转化为一套“主动谋利”的外交架构。

3.3 南海诸国制度夹缝中的策略

相较于陆上邻国的压力感与海洋大国的巧妙腾挪，一些处于更边缘地带的南海诸国，则展现出另一种风格的能动性——灵活、短线、机会导向。马六甲、苏禄、占城等国家，在朝贡体系中的存在更具间歇性与选择性，其朝贡行为往往随着王朝内部政治变化、贸易利益波动而变化。

这些国家的战略行为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碎片化忠诚”，即不形成稳定的依附关系，而是根据当下获利空间决定是否进贡；二是“航线驱动型参与”，以海上贸易网络为核心，只要进入中国市场能够带来实质回报，朝贡身份便成为通行证，一旦利益下降，关系迅速冷却。

马六甲王国便曾在明初大力推崇朝贡，获得郑和护航与军事支持，但在随后百年中逐渐减少贡使派遣，转而加强与南印度洋沿线国家的交往；而苏禄国王则在明代一度被册封为“土王”，甚至赴南京病故，留下朝贡史上的一段佳话，其后却迅速淡出中国视野，转而强化与南洋其他势力的联系。显然，即便是在最“外围”的节点，东南亚国家也从未放弃过对制度空间的操作。

东南亚国家在面对朝贡体系时，更像是在棋盘上游走

的棋手，衡量局势、判断得失，在服从与谋利之间游刃有余。朝贡不是文化的灌输，也非政治的单向压制，而是一种可以谈判、可以操控、甚至可以反向利用的交往机制。正所谓“制度不等于支配，朝贡不等于服从”。

4. 历史视域中的再评价：超越“中心—边缘”范式

传统东亚的国际秩序“中心—边缘”的历史范式，随着区域研究方法的深化与历史语料的多元化解读，成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新的取向。

4.1 重识“边缘”地区的地位

若将“边缘”一词从静态地理描述转化为动态战略选择的空间，其含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这一重新审视的框架中，大越、暹罗、马六甲等“边缘国家”并非被动卷入某种东方礼制的外衣之中，而是积极参与其中、甚至通过制度性操控与文化创新，塑造了区域秩序本身的一部分逻辑。

如大越采取的“外王内帝”策略，并不仅是对中原压迫的一种妥协，更体现了一种极具文化创造性的权力再表述方式。这种制度设计既满足了中原“册封体系”对外部关系的礼仪性要求，又巧妙地保留了国家主权的内部象征，反映出高度成熟的政治艺术。同理，暹罗王朝仿照中国模式对周边部落与国家实施“册封”，则进一步说明“边缘国家”也可发展出“次中心权力”，并在地缘政治网络中扮演主动输出者的角色。

这种“反向投影”式的分析表明，边缘并非弱势的代名词，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形成的战略站位，其背后隐藏着复杂而深远的权力逻辑与文化策略。

4.2 “中心”国家的再认识

中原王朝的对外秩序建构，尽管在礼仪与文化象征上拥有压倒性资源，但其制度并非铁板一块，且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与历史阶段性差异。

明初推行海禁，并将合法贸易锁定在朝贡体系中，似乎构建了一种强有力的外交控制结构。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制度在落实上却充满弹性，甚至不得不屡屡被地方官员与商人“内外联手”所绕过。从郑和下西洋护航的贸易利益，到民间商团借“贡使”名义谋求市场准入，其间的操作空间可谓极广，远非传统教科书所描绘的“铁律执行”那么整齐划一。

清代对朝贡的态度更具消极意味，其“象征性延续”大于“实质性管控”。在面对西方殖民冲击时，清廷对朝贡

国家的政策多表现为不干预或形式性维持，既无力阻止其倒向西方势力，也无法在制度层面有效绑定。这种不完全制度化的权力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理想共同体”而非完全可控的治理网络。

因此，有必要将“中心”从一套具有支配性的实体制度，转化为一种与诸多“边缘”协商、互动、乃至受其影响而不断调整的开放性结构。

4.3 历史叙述的范式转换：从“秩序—服从”到“互动—共构”

无论从“边缘”的能动实践，还是“中心”的有限控制力来看，传统“朝贡体系”并不符合现代政治学中的“霸权稳定”模型。它更接近一种以仪式交往、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弱制度网络”，其运作逻辑体现出较强的协商性与地方适应性。

因此，未来有关传统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或需从“体系—单位”的模型过渡到“共构网络”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朝贡”，不再只是中原单方面投射权力的手段，而是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多方，通过权力博弈、文化互动与规则重构，所共同塑造的动态历史结构。

结语

回望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这些被视为“被动接受”的政权，事实上具备制度驾驭能力与外交技巧。它们既不是被拖曳进历史大势的沉默者，也并非一味顺从的边缘臣属，而是能动的博弈者，甚至在某些时刻，是规则的重塑者。

这种能动性并非抽象理论的延展，而是根植于具体的地理脉络、政治结构与文化传统之中。“频贡”“外王内帝”“册封交换”……这些并非只是礼仪的繁文缛节，而是战略性地嵌入权力结构的工具，其背后隐含着国家意志与生存智慧。东南亚国家借助“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谋外交之势，乃至在特定时刻，以“顺从”的姿态争取“自主”的空间。

朝贡体系不是单线条的支配机制，而是一张动态展开的网络。中原虽为其中强势节点，但绝非唯一动力源。东南亚各国亦如关键节点，在各自的坐标系中调整、协商，甚至牵引这一秩序朝不同方向演化。这种互动结构，远比“中心—边缘”的想象更复杂，也更真实。曾经由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参与的等级制的朝贡体系和主要由东南亚国家参与的关

系相对松散的曼陀罗体系，除了让我们能够追寻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联，这些前现代国际体系与当前东北亚、东南亚的国际政治问题并不能建构出真实、紧密的关联。因此，并不是所有历史知识都能够参与当今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叙事的重构。^[6]

因此，真正理解东亚传统国际秩序，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中国的外交策略或礼制安排，而更应关注那些“边缘国家”如何在其中选择、调整、突破，甚至反向影响“中心”的思维与制度设定。如此，历史才不再是一方独奏的宏音，而是多声部交错的复调。未来的区域研究，唯有承认这些“非主角”的主动性，才能真正跳出宏大叙事的单向度局限，进入一个多元对话、协商秩序与战略意图相互穿插的东亚历史新图景。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弗·科克 张依，“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正在成形：〈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摘译”，《东方学刊》，2022 年第 3 期，第 62 页。

[2] 何强林，“丝绸之路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读后”，《唐史论丛》，2025 年第 1 期，第 420 页。

[3] 陈尚胜，“清代开海政策与互市体系”，《历史研究》，2025 年第 4 期，第 112 页。

[4] [日]冈本隆司：《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86 页。

[5] J.K.Fairbank and S.Y.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 No.2, June 1941, pp.155-156.

[6] 王文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叙事批判：重思亚洲情境”，《太平洋学报》，2024 年，第 11 期，第 7 页。

作者简介：杜军，1984 年 11 月出生，宁夏隆德人，宁夏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析》（NYG2024198）阶段性研究成果。